

近代汉语引论

杨建国 编著

黄山书社

近代汉语引论

杨建国 编著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王克谦

封面设计：舒 畅

近代汉语引论

杨建国 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字数：135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000

ISBN7-80535-427-8/H·7

定价：3.05元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近代汉语的时限·····(1)
- 第二节 近代汉语另面观·····(2)
- 第三节 一种调和的方案·····(4)

第二章 近代汉语的语料文献

- 第一节 小说话本类·····(6)
- 第二节 诗歌曲文类·····(15)
- 第三节 儒释语录类·····(20)
- 第四节 讲义读本类·····(27)
- 第五节 史籍碑铭类·····(29)

第三章 近代汉语的参证文献

- 第一节 前人注疏·····(34)
- 第二节 前人笔札·····(39)
- 第三节 字书、辞典、韵书与音义书·····(43)
- 第四节 前人有关俗语方言的专著·····(49)

第四章 近代汉语文献整理说略

- 第一节 文献整理的基本过程·····(59)
- 第二节 文献整理中常见的版本名称·····(60)

第三节	校勘的基本方法	(63)
第四节	敦煌文献校录例说	(69)
第五节	《全唐诗》校证例说	(72)
第六节	校勘录例二则	(75)

第五章 词义考索与词语研究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78)
第二节	考索词义的方法	(80)
第三节	词义考索的多角度与多层次	(92)
第四节	普通口语词语的收罗和研究	(107)
第五节	复音词的收罗与研究	(110)
第六节	方言词语的鉴别与研究	(113)

第六章 语法散论

第一节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心	(117)
第二节	词缀的新检讨	(119)
第三节	量词的类别与特例的考索	(151)
第四节	新兴指代词语源试测	(162)
第五节	介词、动词与句式的流变	(177)
第六节	副词、形容词与修饰语	(185)
第七节	试说“轻声”现象	(193)

后记	(197)
----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近代汉语的时限

粗粗看来，“近代汉语”自然是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相对的概念。在汉语发展史中，只要确定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地位，当间儿的，自然就是“近代汉语”的领地。可语言这东西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它自身内部的细密繁复系统，外部人文史地的诸种影响，常常使研究者处于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就汉语来说，方块字的掺合，情形就显得更加繁杂难定。一讨论到分期问题，“大致”一词就成了常见的字眼。这既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怕也是应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影响语言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很多，可以想像，据以划分时限的依据也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纯从语言角度考察，近代汉语自然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而现代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这状况，当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北方话是个地域很广的概念，它包括北方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与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对于现代普通话来说，最重要的怕是以北京语音为中心的北方次方言。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不妨说，什么时候汉语共同语以北方次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中心，就定

这时期为近代汉语的开头。

汉语历史上，上古早期，信史难征，无法确言。但至少到了西周末年，汉语共通的统一的文学语言“雅言”已逐渐形成。这“雅言”该是以西周王畿一带(今西安一带)方言为基础。秦、汉时期，大致也该这样。《汉书》所出词语，多与颜注所云“今关中”、“关西”俗呼相合就是明证。魏晋南北朝是个分裂的时代，其间由于人们四处迁徙流转，方言融汇的速度自然更快，范围自然更广。继之所谓“隋唐故语”，又是以长安为中心。直到南宋偏安(一一二七年)之后，金、元相继定都燕京的时候(一一五三年金海陵王自上京迁都燕京，一二七二年元改金之燕京为大都)，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才渐渐由西而东，转向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次方言小区。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终以北方语音为标准，展现了平分阴阳、入派三声、声母不分清浊的汉语新貌，显现了现代汉语语音结构的基本格调。

因此，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十三、四世纪，是有根据的。

第二节 近代汉语另面观

如果暂时把方言置于考虑之外，一种语言，就其表现形式说，可以大别为口语与书面语。口语以语音为其传播工具，书面语以文字为其传播工具。

汉族人民采用的方块汉字，就性质上说，是一种不标音的形意文字系统。汉字的这种性质，是汉语书面语和口语逐渐脱节的重要原因。因此，汉语发展史中，出现了统一的书

面语和相互分歧的方言平行发展的局面。二者相倚相辅，鱼水和合，景象真是动人得很，又何止是“井水不犯河水”！汉语言文字维持如此久长的局面，真是实现了大一统与小自由的辩证结合。这种局面，自然还要继续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加工形成的一些书面文献，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而渐次被尊为“经”。后世模仿沿袭，逐渐形成了我国书面语中的一大系列——文言文。先时，它还比较接近口语，后来，渐渐和口语脱节。有的学者主张把这一大系列作为“古代汉语”的主要研习对象，如象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绪论》中所说的那样。这个意见虽是就“古代汉语”而言，但却引发了对“近代汉语”别样理解的契机。

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为了宣讲教义，佛徒开始翻译佛经。为了适应百姓口味，不得不寻求一种上下咸宜的文体，不得不舍弃典雅的古文与藻丽的骈文。这样，一种文白夹杂的佛经文字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另一面，文人学士于作诗为文之暇，惑于古怪离奇的民间传说，提笔随意记录之际，不经意间，文字中注入了不少当时的口语成分。这就是今天见到的魏晋笔记小说。两股文字交汇，聚成了近代白话清浅的源头，潺潺流去，终致涌出了唐时的变文与传奇。于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近代汉语读本》吕序）。显然，吕叔湘先生的这一建议，也是有根据的。

把近代汉语定自始于晚唐五代，自然是以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程度为主要依据。但这一来，有唐一代直至魏晋南北朝

那些文白夹杂的文字，似乎总和“近代汉语”有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因此，在为《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一书所写的《序》中，吕先生干脆主张把汉语史分作三大部分，即：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如果这样，近代汉语研习的对象就是白话文这一系列，而“近代汉语”就不再单纯是汉语史纵向分期的概念。我们相信，这一主张将会对汉语史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现在似乎暂时还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

第三节 一种调和的方案

既是“调和”那自然是权宜之计。

就白话与文言而言，宋代以前，二者并非判若泾渭，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敦煌变文也不例外。从纯语言角度看，与文言相对的一套白话虚语素，其中不少（甚至可说是很多）都是首先出现在唐代书面文献中。周祖谟先生曾说，“现代普通话的语音不同於《切韵》，其演变远自唐代就已经开始。”（见《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二百二十三页。）

因此，我们主张暂时将有唐一代整个包括在近代汉语之中，不必单单限在晚唐五代。这样，研习起来，似乎更便于上溯其源，下探其流，易于处在“左右逢源”的地位。

因此，我打算就从唐代说起。

第二章 近代汉语的语料文献

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一样，都是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因此，古代流传下来的书面文献就成了研究的主要依据。较之古代汉语，反映近代汉语的书面文献，品类之多，体裁之杂，远非文言文所可比拟的。而且，有些文献还处于“原始状态”，未经开掘，自然又显得零乱许多。因此，文献的清理工作就成了近代汉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整理也是一种研究，而且工作的难度，功力的要求，丝毫不比所谓的正式研究更低。吕叔湘先生强调指出当前近代汉语研究第一位的工作是“需要编写近代汉语文献的解题目录”，以“分门别类著录各种文献资料，说明它们反映实际语言的程度，作为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价值，以及版本情况，等等”。（《近代汉语读本》吕序）

就内容的性质看，近代汉语语料文献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五类：

一、小说话本类

此类大致包括唐人小说、唐五代变文、宋元话本、明人拟话本以及明清长篇白话小说。

二、诗词曲文类

此类大致包括唐诗、宋词、戏文、诸宫调及元曲。

三、儒释语录类

此类大致包括唐宋禅家语录与两宋理学家语录。

四、讲义读本类

此类主要包括元明两代文学侍臣所作的解经讲义，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会话读本。

五、史籍碑铭类

此类主要包括唐代与唐代以后所修史书以及野史、实录和碑铭。

就内容看，五类文献，函盖文史哲三方。前两类，多为臆逞才情之作，自属文学作品。三四两类，言涉理趣，多为哲学论著。第五类，志人记事，多为史料文献。

下面，依据前人著录与时人论述，分别作些介绍。取舍之间，排比之次，则略掺己意而已。

第一节 小说话本类

唐人小说

唐代的短篇小说(传奇文)，是中国古典小说“自立门户”的开始。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既“有意为小说”，内容自不能不受唐时社会生活制约，语言也不能不受唐时俗语牵制。故今日所见之唐人小说，虽以文言为框架，却总给人以“旧瓶装新酒”的感觉。从中，不时可以窥见唐时口语的情貌，不论是语法方面还是词语方面。

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九七八年)编成的古代小说

总集《太平广记》，收录上迄先秦，下逮宋初的作品共约七千则，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约近三百万字，各篇不以时代先后为序而依类编次。这种编法，于考察内容自然有利，但若作语料文献，自不如以年代为序便于检索。此书太平兴国六年雕版成就，是否开印，不得而知。现今所知版本，只有以下五种：一、明谈恺刻本；二、明末长洲许自昌刻本（当年鲁迅先生编选《唐宋传奇集》即用以作校本。）；三、明吴郡沈氏野竹斋钞本；四、清陈鱣校本；五、清黄晟刊本（即《唐宋传奇集》所用底本）。

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据谈刻本出版了排印本，此书方始广为流布。

另，主要据《太平广记》编撰的唐人小说选本主要有：一、鲁迅《唐宋传奇集》，内中以唐人小说为主。二、汪辟疆《唐人小说》。以上两位先生的选本，影响较大，入选篇目质量很精，唯数量稍少。三、王汝涛、余润泽等四人选注的《太平广记选》上下两册，一九八〇年齐鲁书社出版。此本所收全为唐人小说，且是前两种选本未收的篇目。内中涉及唐人专集三十多种，每种都作了简略的介绍，甚便于检索利用。

敦煌石室藏书

据《汉书·西域志》载，敦煌置郡，始于汉武之世。先置酒泉，后又分置武威、张掖、敦煌，“置四郡，据两关焉”。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古又称瓜州、沙州，所谓“瓜沙地区”就是指的这块地方。敦煌西边不远，就是“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西南七十里的南湖店，就是西出无故人的阳

关旧址。可以想见，古代的敦煌既是丝绸之路的要站，也是戍边御敌的重镇。和着悠悠的驼铃，伴着森森的刀影，它度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所谓“敦煌石室”，原本应指四个地方，即莫高窟、西千佛崖、榆林窟和水峡口。只因藏经洞的发现是在莫高窟，所以它就格外出名。

莫高窟位于今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藏经洞就是张大千先生编号为一五一号的那个大洞。此洞原是唐大中五年（公元八五一年）沙门洪誓所建。据说，大约到了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一〇三五年），时值西夏之乱，当地僧人避难他乡，行前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等封藏在这大洞甬道的复洞之中，此后，那些僧人怕再也没有回来，而此洞一闭，也就无人再开。不意光绪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此洞却被道士王元篆发现，于是，石室藏书又复现于世。据后来统计，石室藏书总数约在两万卷以上。

一九〇七和一九一四年，英人斯坦因两次赶到敦煌，先后劫去约有七千卷，即今以“S”起头编号的那些。一九〇八年，法国汉字家伯希和又运走一千五百卷，即今以“P”起头编号的那些，劫余部分，约有八千卷，现藏北京图书馆。此外，还有少量流散在其他国家以及国内外私家之手。

两万多卷石室藏书，几乎都是写本。就内容看，有佛家经典、儒家经典、俗讲底本、白话诗词以及杂录等等。

唐代和尚诗人贯休《赠写经僧楚云》（载《全唐诗》八三七卷）一诗云：“剔皮刺血诚何苦，为写灵山九会文。十指沥干终七轴，后来求法更无君。”从中可以想见，对于“写经”，唐时僧人是何等虔诚，竟至不惜“剔皮刺血”，“十

指沥干”，血写经书！这种虔诚的信念，反映在石室写本佛经中，大约就是和尚抄手在写本佛经之后的“题记”。这些“题记”，多有“勘了”、“一校竟”、“校定无错”、“二校”、“三校”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何等地郑重其事。另外，当时一些目不识丁的善男信女，为了祈求神佛佑助，出钱雇人抄经，那心情也该是够虔诚的。只是所雇抄手，抄经不过是种谋生手段，抄经之余，偶而也会在经书尾处写上几句即兴之作。这又成了写本佛经的另一种“题记”。抄手文化水平就不高，又是即兴之作，那口语化的程度，倒反值得重视。现转录两则于下：

写书不饮酒，终日笔头乾。

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

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看到这里，不禁使人想起张相与蒋礼鸿两先生所释的“谁家白面郎”与“谁家薄媚郎”（详释见后）。

许国霖先生据北京图书馆馆藏写经辑成《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书，收有四百多条题记。据题记可考知写经年代的有四十三卷，最早的为北魏太安四年七月三日（公元四五年），最晚的是宋太平兴国二年闰六月五日（公元九七七年）。另外，胡适先生为此书所写的序，读读也颇有兴味与收获。

石室藏经中，竟然发现有一刊本《金刚经》，保存完好。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印本之一，文化价值自不待言。

石室所出儒家经典，涉及经、史、子、集四部。这和版本学、校勘学与古代汉语关系密切，这里自不必多说。

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一文写道：

顾在石室藏书中，尚有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论体裁则韵散间出，其名称则变文、词文、押座文、缘起，不一而足；其内容则敷衍佛经，搬演史传。（文载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

这种通俗文学作品，就是唐代寺院盛行的俗讲的底本或记录本。在《敦煌变文集》引言中，向达先生又说：“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变文云云，只是话本中的一种名称而已”，因此，现在大家用“变文”通称这类话本，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而已，并不顾及以偏概全之嫌的。“变文”的原义，似乎该是伴有图画(变相)的说唱底本。这或许就是后世全相平话与插图小说的滥觞。

现存变文一类作品，有些卷末署有年号，多数是五代时期的。如《汉将王陵变》卷末，即署有“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阎物成写记”。天福为五代后晋石敬瑭年号，四年即公元九三九年。个别卷子署年，有晚至北宋初年的。这些署年，是当年俗讲者自署，还是后来抄写者题记，自己难于一一考知。因此，现在一般把变文定在晚唐五代，并不是不可怀疑的，那年代，或许更可以提前。

现存变文的重要辑本与选本有：一、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一九五五年）二、王重民等六先生《敦煌变文集》（一九五七年）三、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一九八四年初版）四、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

另外，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岳麓书社出版了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师生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校议》，著录了敦煌变

文校释的重要成果。

敦煌白话诗词重要辑本有：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一九五〇年）。二、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一九五五年）。三、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一九八七年），此书是在《校录》一书基础上不断增补而成，收载敦煌歌辞一千三百余首，而且“合歌辞与理论於一编”，正文之前，附有“敦煌歌辞研究年表”，就中可寻敦煌词研究脉络之大概。四、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一九八三年）。此书据敦煌遗书二十八种不同写本，以及唐宋诗话、笔记小说里共收集的王梵志诗三百三十六首，经过点校、考释，整编成王梵志白话诗全集。据考订，王梵志诗产生于初唐时期、大历年间，其诗手抄本流传到敦煌地区。王梵志诗的辑集，连同《全唐诗》所收寒山、拾得等人白话诗作，为我们研究唐时白话诗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又，此书书后附有《王梵志诗语辞索引》，以首字笔划为序，甚便检览。

石室所出杂件，主要是民间经济往来的文契，如借麦种牒、雇作儿契、卖地契之类，因为写契者文化程度有限，提笔之际，自是口语流入笔底。因为是契约，自会常常注明写契年月，作为资料，这点自然十分重要。这类契约文书的辑集，有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编集的《敦煌资料》（一九六一年）。

敦煌文献目录目前最完备的是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编印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宋元话本

隋唐时，讲故事就叫“说话”。说话人的底本，就叫“话本”。《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云：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说一个好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唐郭湜《高力士外传》记云：

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一旦失落权力，玄宗晚年终以听说故事来打发时日。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云：

“又尝於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此诗作于元和五年(公元八一〇年)，“新昌宅”即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的住宅。“一枝花”是长安名伎李娃的别名，“一枝花话”自然就是关于李娃的故事。据此，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曾经写了传奇《李娃传》。李商隐《娇儿诗》里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多数小说史家都认为这里唐代已有说三国故事的证据。总之，唐代即有说话，这是毫无疑问的。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显然就是说话的底本。其实，敦煌写卷中，不少说唱文学卷子未尝不可以话本看待。

两宋时，说话更为发达，这由《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的有关记载中可以得知。两宋说话虽有四家之说，但主要却是小说与讲史两家。

下面，将宋元话本刊本分别作些介绍。

一、《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原书当为宋刊本，后流入日本。一九一六年，罗振玉自日借回影印。现通行本有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排印本与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罗氏影印本。此书语言风貌，倒与唐